

《中國叢報》與 19 世紀西方漢學研究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 as the World's First Major Journal of Sinology

尹文涓 (Yin Wenjuan) *

前言

人們在追溯中西文化交流史時，大都會注意到來華耶穌會士在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知識方面的巨大貢獻和他們對西方漢學的奠基性工作。但到目前為止，人們對他們的後來者、19 世紀初期第一批來華新教傳教士所出版的大量的介紹、描述中國的中、英文書刊卻較少關注。就如那些耶穌會士前輩們一樣，他們通過寫作一方面向中國人輸送了大量西方文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極大地豐富了西方關於「中央帝國」的知識。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 (E. C. Bridgman, 1801-1861)¹ 1832 年在廣州創辦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² 就是其中最有影響的出版物之一。作為第一份面向西方讀者、以介紹、研究中國為主要內容的英文報刊，《叢報》二十年間從語言、文化、政治、宗教、地理、商貿等多個方面對中國的歷史與現狀進行了詳細的描述，被美國史學家賴德烈稱為研究「中國及其屬國最真實、最有價值的情報」。³

本文擬從《叢報》的辦報主旨、內容及其與歐美漢學家、漢學發展的關係，來考察《叢報》對 19 世紀西方漢學研究的貢獻，及其在現代漢學學科發生發展的過

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並由此進一步探討《叢報》面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

在《叢報》首卷創刊詞中，裨治文介紹有必要創辦這樣一份刊物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如同龐然大物的中央帝國」，提供了「天底下最寬廣、最有價值的研究領域」。雖然「歷史上曾有人周遊過這個國家，並留下許多有關人與事物的有價值的記載。但是這些早期的描述在今天看來有太多難以置信的內容……其中很多舊書，儘管它們具有一定意義，但也包含許多不具有再版價值的內容。現代作家的描敘中，也有許多不清楚和不盡人意的地方，譬如就人口而言，統計出來的數字竟是從二千萬到『天文數字』3.33 億不等。」因此，該刊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對外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籍進行評論」，並對中國的博物、商業、社會關係、宗教特徵等各方面「予以密切關注」。⁴《叢報》創辦四年後，對自身的抱負說得更為明白：「本刊內容將包括所有關於中國人的重要的、值得記錄下來的描述與事實，他們的典制、教育、風俗、社會交往、禮儀、宗教、迷信、歷史、藝術等等。我們希望藉此能讓人們遠比現在更多更

* 作者現就讀於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

1 裨治文 1829 年受美國傳教會總部派遣來華，1861 年病逝於上海。相關研究見：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Canton, Macao, & Hongkong, 1832-1851. 下文簡稱 CR 或《叢報》。

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p.9.

4 E. C. Bridgman, "Introduction," in *CR*, v.1, pp.1-5.

精確地瞭解這個帝國的狀況、它的人民的特點和要求……」。⁵ 由此，我們可以將《叢報》的主旨概括為「關於中國」的研究。而「關於中國」的研究即為我們現在所稱的漢學研究。

現代詞典對「漢學」的定義可充分支持上述觀點。《牛津英語詞典》對「漢學」(sinology)的定義為「一切關於中國的研究」(the study of things Chinese)，⁶ 而權威的法語拉羅斯詞典(Larousse)對「漢學」(sinologie)的定義則為「關於中國歷史、語言、文化的研究」(Etude de l'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s)。⁷ 那麼，我們似乎可以這樣來理解漢學研究的範疇，即：一切關於中國的研究，如歷史、語言、文化。

通常我們是把 1814 年法蘭西學院設立第一個漢語教席視為近代(學院式)漢學開始的標誌。與此同時，法語中“Sinologie”這一詞始出現在一篇題為《漢學史》(L'histoire de la sinologie)的文章中。⁸ 但這一詞直到 1878 年才正式進入法語詞典中。⁹ 如果我們將某詞正式進入詞典看成該詞所指範疇合法化的標誌的話，那麼，從學科史的角度而言，現代漢學從有研究活動到這門學科被正式確認經歷了比較長的一段發展時間。有意思的是，在這一段時間內漢學研究的狀況如何呢？

根據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中國書目》和目前可考的其他期刊目錄，在《叢報》1832 年創刊前，

巴黎、倫敦等地所出版的涉及中國的刊物計有七種。¹⁰ 其中六種是以整個亞洲為研究對象，關於中國的內容並不多，¹¹ 另外一種將印度和中國一併納入其範圍之內。¹² 雖然其他學術刊物發表過關於中國的文章，但分量極為有限，如《愛丁堡評論》(1802-, Edinburgh)在 1832 年前一共只發表過 6 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北美評論》(1815-1940, Boston)、《布萊克伍德雜誌》(1817-1980, Edinburgh)更少。¹³

從上面的定義和資料我們似可得出以下兩個推斷：

- (一) 這一時期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和瞭解非常有限。
(二) 《叢報》是世界上第一種重要的漢學期刊，對這一定義，下文將進一步補充。

二

根據漢學的定義，我們可以把《叢報》中涉及漢學研究的內容分成兩部分來討論：一部分是對「關於中國的研究」的研究；另一部分就是「關於中國的研究」。

《叢報》對「關於中國的研究」的研究，即對「漢學」的研究，是指對歐洲現有漢學成就與動態的介紹與評價。這部分內容最集中地體現在《叢報》的「書評」和「文學動態」這兩種欄目中，另外還有一些「專論」文章，介紹漢學研究史、漢學家生平等。¹⁴

「書評」是《叢報》比較固定的一個欄目，《叢

5 E. C. Bridgman, "European Periodicals beyond the Ganges," in *CR*, v.5, p.160.

6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v.15, p.538.

7 *Larousse*, Librairie Larousse, Paris, 1985, p.9610.

8 該文發表在 1814 年 *Mercure Etranger* 雜誌第三期上，作者為 L. A. M. Bourgeat，詳見 *Tresor de la Langue Francaise*, (Gallimard, 1992), v.15, p.540.

9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v.15, p.538.

10 按出現先後分別為：*Asiatic Researches*, 1799-1812, 11Vols, London; *Mines de L'Orient*, 1809-1818, Paris; *Asiatic Journal*, 1816-1843, London; *Indo-Chinese Gleaner*, 1816-1821, Malacca; *Journal Asiatique*, 1822-, Pari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23-, London; *the Nouveau Journal Asiatique*, 1830?-, Paris. See,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1904-1924.

11 衛三畏認為這些刊物對印度的關注要遠遠多於中國。S. W. Williams, "List of Works upon China, principally in English and French languages," in *CR*, v.18, p.435.

12 即：*Indo-Chinese Gleaner* (《印華拾零》)，上有大量關於中國的內容。

13 William Frederick Poole, *Poole's Index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 1802-1881*, v.1, Massachusetts: Peter Smith, 1958, pp.231-236.

14 《叢報》每期的欄目編排比較固定，根據其編排規律和內容，筆者將《叢報》的欄目歸納為主要的五大類，即：專論、書評、文學動態、宗教通訊、新聞雜俎。

報》共發行了 232 期，幾乎每一期都有書評內容。據筆者統計，《叢報》二十年間一共介紹了 256 種中、外文出版的、關於中國或與中國有關的書籍。鑒於這些書籍的內容十分龐雜，我們只得按作者來歸類分析。第一類書籍是明清早期來華耶穌會士關於中國的報導和研究，如曾德昭 (Alvarez Semedo) 的《中國史》、¹⁵ 馬若瑟神父 (J. H. M. Prémare) 的《中文文法》、¹⁶ 李明神父 (Le Comte) 的《中國現勢新志》、¹⁷ 還有 1781 年在法國再版的《奇異而有趣的信笈》，¹⁸ 等等。第二類是早期歐洲 (非傳教士的) 有關中國的記載，如門多薩 (J. G. de Mendoca) 的《中國歷史》、¹⁹ 還有一些佚名遊記，如《叢報》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關於 9 世紀兩個阿拉伯人在印度和中國遊歷的記載。²⁰ 第三類書是同時期西方人出版的關於中國的書籍，這其中包括那些歐洲漢學家的著作，如雷慕沙 (Abel-Rémusat) 的《佛國記》、²¹ 儒蓮 (M. S. Julien) 的《中國文字》、²² 巴贊 (M. Bazin Ainé) 的《中國戲劇》²³ 等，和那些在華的傳教士、外交官、商人、旅遊者對中國的描述和研究，如斯當東 (G. L. Staunton) 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²⁴ 古伯察 (M. Huc) 的《韃靼、西藏、中國遊記》，²⁵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的《英華詞典》等。最後一類是當下中國人的著作，尤其是中國人對西方的描述如：《海錄》、《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

對《叢報》主編裨治文而言，之所以要重新評價此前那些描述中國的書籍，是因為「此前歐洲人寫的關於中國和中國人的大部分書籍都充滿了錯誤……耶穌會士

在地理方面做了大量的調查，這是我們現在所見的關於這個國家的最有價值的記錄，如果不是最主要的話。」²⁶ 裨治文認為耶穌會士關於中國的描述，其可取之處在於他們是以「在場」的觀察和調查為根據。但是，那些沒有到過中國的人，特別是那些不懂漢語的人，他們對中國的描述和研究是尤其值得懷疑的。

《叢報》這些書評一般都在文章開頭儘量詳細地列出了該書的作者、出版地、年代、原書名、譯名、譯者、卷冊、頁數等情況，藉此我們可以瞭解到很多重要的版本信息。如從中可以發現門多薩的《中國歷史》1588 年曾在倫敦出版德文本，李明神父的《中國現勢新志》於 1737 年在倫敦出版了英譯本，馬若瑟神父的《中文文法》的拉丁文版首先是 1831 年在麻六甲書院出版的，此後又於 1847 年在廣州被英譯出版，《伊索寓言》的幾種中文方言譯本等等。使我們得以瞭解上述這些關於中國的、在今日看來頗為重要的著作在當時被接受和傳播的情況，還有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程度和閱讀興趣等。

此外，除了上文提及的那些在今天看來仍然影響較大的書籍外，《叢報》中還有很大一部分可能並不是很經典，或者是在當時影響較大、但後來卻漸漸湮沒無聞的書籍。特別是那些在華出版而且數量不多的書籍，不少已無今本傳世。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早期來華外國商人、傳教士等為學習中文或向中國人教授外文而編撰的各種各樣的方言、土語、官話詞典，如某個中國無名氏編寫的《紅毛買賣通洋鬼話》，²⁷ 裨治文本人編撰的

15 Alvarez Semedo,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1655), in *CR*, v.1, p.473.

16 J. H. M. Prémare, *Notitia Lingue Sinice* (Malacca, 1831), in *CR*, v.1, p.152; v.16, p.266.

17 Le Comte, *Memoirs and Remarks on China* (London, 1737), in *CR*, v.1, p.249.

18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Paris, 1781), in *CR*, v.1, p.378.

19 J. G. de Mendoca, *Historia de la China*, in *CR*, v.10, p.241.

20 *Ancient Account of India & China*, by two Mohammedans, in *CR*, v.1, p.6-42.

21 Abel-Rémusat, *Memoir on Buddhism*, in *CR*, v.1, p.155.

22 S. Julien, *Examination of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Paris, 1830, tr. from Latin by S. R. Brown, in *CR*, v.10, p.222.

23 M. Bazin ainé, *Théatre Chinois*, Paris, 1838, in *CR*, v.18, p.113

24 Sir Staunton,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1798), in *CR*, v.2, p.337.

25 M. Huc,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le Tibet, et la Chine, pendant 1844-1846* (Paris, 1850), in *CR*, v.19, p.650.

26 E. C. Bridgman, "Intellectual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in *CR*, v.7, p.2.

27 S. W. Williams, "Hungmaou Mae Mae Tung Yung Kwei Hwa," in *CR*, v.6, p.276.

《廣東方言詞典》。²⁸ 這些詞典真實地記錄了當時中外文化在語言層面的交流情況，《叢報》關於這些書刊的記載對我們還原中國研究的歷史原貌無疑是極有幫助的。

「文學動態」中最重要的內容，當數《叢報》對1851年前發行的、登載了有關中國內容的期刊的報導。據筆者整理，《叢報》一共介紹、轉載了大約86種在世界各地刊發的中外文報刊，²⁹ 其中有四十多種是在中國或在華南沿海一帶刊行。可以說當時沒有哪一種刊物會如此集中、詳備地搜羅了報刊這種媒體上關於中國的情報。《叢報》對公眾輿論的這種關注顯然是與它自己作為一種新聞刊物的身分有關。從這些目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如今仍然很重要的學術刊物的名字，如《亞洲學刊》、《愛丁堡評論》、《北美評論》等。但更多的是那些由於種種原因後來停辦或改名的期刊，這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應該是那些在中國及沿海出版的那一部分，如中文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甚至還有只出過一兩期的，如在廣州出版的《蜜安士貿易報》（Meadow's Commercial Reporter 1847.3-1847.5）。《叢報》對這些期刊的記載現在成了研究這些報刊的重要的、有些甚至是唯一可靠的材料。實際上，筆者目前尚未在關於中國報學史的研究中發現較完備的採錄。

根據所報導的內容來看，《叢報》徵引的這些期刊大部分都是編輯手頭現有的。當時《叢報》和很多現刊都互有贈刊，³⁰ 而且，當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新教傳教士一直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繫、互通有無，這樣就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新聞網」。從當時的交通狀況而言，《叢報》對最新動態的反應算是相當迅速的，如雷慕沙

發表在1831年10月號《亞洲學刊》上一篇論佛教的文章，在1832年8月號的《叢報》上就被報導，³¹ 這不禁使人驚歎當時這些在華外僑的「信息化」程度。

《叢報》的「專論」一欄通常都是放在每期第一篇文章的位置，以示其重要性。這些主論文章中就有不少是回顧歐洲漢學史或者是介紹漢學家生平的內容。如裨治文刊登在《叢報》第三卷的《中國語言，及歐洲對此的關注》一文，在強調學習中文的重要性之後，裨治文還非常詳細地介紹了歐洲人對中國及中國語言的認識程度和研究情況。他首先肯定了法國人在這方面的領先地位，然後依次介紹了歐洲各國在漢學方面的進展。在裨治文看來，雖然已經有少數人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但其成果還遠遠無法與這個帝國應該被重視的程度相提並論。最後，他還特別提到美國人「關於中國和中文的知識都少得可憐」。³²

《叢報》中「關於中國的研究」，即《叢報》本身在漢學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體現在那些關於中國文化、文學、歷史等的專論文章中。從撰稿者來看，他們多為在華傳教士、外交官、商人，如裨治文、衛三畏、鮑寧、³³ 德庇時、韋妥瑪、³⁴ 吉德、³⁵ 斯當東、馬禮遜等，其中還有一兩個中國人。從內容來看，關於中國語言文化和歷史的討論分量最重，如他們對《四庫全書》、《朱熹全集》等中國典籍的文學、思想價值的闡釋。像第11卷中郭實臘對《紅樓夢》的介紹應當是西人對《紅樓夢》最早的解讀。³⁶ 戈公振先生在總結外人在華所辦報刊的作用時，對他們在中國典籍研究方面的成就做了非常肯定的評價：「渠等又致力我國經籍，貫申考核，討流溯源，別具見解，不隨凡俗。」³⁷

28 E. C.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41), in *CR*, v.11, p.157-223.

29 要說明的是，《叢報》所介紹、轉載或提及的期刊體裁、週期不一，有按月、季、周、半周、日出者，也有不定期者，在《叢報》中被統稱為periodical, magazine 或 newspaper，分類不如現代意義的「雜誌」、「報紙」明顯。這也是19世紀報學史的特點之一。

30 E. C. Bridgman, "European Periodicals beyond the Ganges," in *CR*, v.5, p.160.

31 Robert Morrison, "Memoir on Budhism by Abel-Rémusat" (from *Asiatic Journal*), in *CR*, v.1, p.155.

32 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 attention Paid to it by Europeans," in *CR*, v.3, p.1-14.

33 Sir John Bowring, 1792-1872, 激進刊物《威斯敏斯特評論》主編、香港第四任總督（1854-1859）。

34 劍橋大學首位中文教授(1888)。

35 Samuel Kidd, 倫敦大學首任中文教授（1838）。

36 Karl Gutzlaff, "Dreams in the Red Chamber," in *CR*, v.11, p.266.

《叢報》在 19 世紀 30 年代對關於中國文字拼音化的主張，³⁷ 以及對中國語言中白話文體的探討都是極具超前意識的。

《叢報》的中國語言文字、文學觀很值得重視。裨治文在《中國語言》一文中認為，中國有其豐富、燦爛的文學傳統，在這一點上，恐怕連古希臘、羅馬也是難以企及的；中國語言文字多變、生動、富於表達。但這一傳統已經在逐步衰落，需要更新。對大家而言，若想要和中國人及政府溝通，就必須得先學習中文，瞭解這個帝國的歷史和現狀，由此將其從沒落中拯救出來。³⁸ 不可否認，裨治文這一抱負中包含著「基督征服」中國的根本願望，但他強調瞭解中國文化才能與中國溝通還是頗有見地的意見。在這一點上，裨治文的觀點似與艾田蒲的「要使中國皈依改宗，前提是必須讓自己皈依中國」的論斷有某些契合之處。³⁹

三

《叢報》第 18 卷 8 月號上用四十多頁的篇幅登載了一份漢學書目，題為《關於中國的著述》。⁴⁰ 該書目一共收錄了 403 種西方人撰寫的關於中國的書籍及少數與中國有關的刊物，⁴¹ 主要為英文和法文著作，涉及 251 位作者，年代起於 1560 年，迄於發文前的 1848 年。編者在每條書目下面，都列出了該書詳細的版本信息、

內容簡介，並對該作品的價值、影響做了簡要評述。此外，對在《叢報》的書評中曾被介紹過的作品，都有個別說明，並標明出處。值得重視的是，該書目並不是對其所收錄作品的簡單羅列，而是按內容分為「中文學習工具」、「西譯中文書籍」和「關於中國的書籍」三大類，並在每大類下加以細分。這種分類的企圖體現出《叢報》是在對前人和現有研究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對漢學研究有了某種學科化和綜合性的思考，因此，這個書目實則可以視為《叢報》的漢學研究走向成熟和自覺的標誌。⁴²

該書目的價值還在於它對 20 世紀初期考狄《中國書目》的影響，有很多線索可以說明這兩個書目之間的承襲關係。考狄在其書目的序言裏，提到他編撰該書目是緣起於 1868 年左右，他到上海「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上海分會」的圖書館工作之時。⁴³ 「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上海分會」，也稱「亞洲文會」，其前身就是 1858 年成立的上海文理學會，裨治文任首任會長。⁴⁴ 翌年歸屬「英國皇家學會」，改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上海分會」，仍是由裨治文負責。⁴⁵ 該會有一個圖書館，還發行了一個會刊，⁴⁶ 1871 年在虎丘路建永久會所。這個學會實際上是《叢報》停刊後裨治文在上海所經營的最重要的事業。雖然考狄到上海時，裨治文早已過世，但不應否認這個圖書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先《叢報》的基業。在序言中，考狄提到該會圖書館中所藏 1300 冊西

37 參閱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修訂版，頁 93。

38 I. Tracy, "An Alphabetic Language for the Chinese," in *CR*, v.4, p.167.

39 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 attention Paid to it by Europeans," in *CR*, v.3, p.1.

40 參閱[法]艾田蒲著，《中國之歐洲》，許鈞等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994，上卷，頁 192。

41 S. W. Williams, "List of Works upon China, principally in English and French languages," in *CR*, v.18, p.402-444, p.657-661.

42 《叢報》上該書目的編號為 402 種，但由於有兩個 141 號，所以實際數目應為 403 種。S. W. Williams, *op. cit.*, p.420-421.

43 《叢報》中還有另外三份重要的書目：1. 《馬禮遜教育委員會圖書館館藏書目》，See, E. C. Bridgman, "Catalogue of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M.E.S.," in *CR*, v.14, p.288; 2. 《西域書目評述》，See, M. S. Julien, "Notices of Works upon the Si Yih," in *CR*, v.17, p.575; 3. 《暹羅書目》，See, J. T. Jones, "Bibliographical Notices of Works Relating to Siam," in *CR*, v. 18, p.23。這三個書目也很值得重視，但囿於篇幅，這裏不作展開。

44 Henri Cordier, "Preface", *Bibliotheca Sinica*, v.1, Paris, 1904, p.1.

45 Michael C. Lazich, *op. cit.*, p.375.

46 Michael C. Lazich, *op. cit.*, p.378.

47 從該刊創刊詞的主張和內容來看，這個刊物實際上是《叢報》的續刊。見："Preface," *Journal of the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No. 1, July, 1858, Shanghai.

文和 1083 冊中文書刊正是他開始編撰書目的基礎。此外，他還提到對包括《叢報》漢學書目在內的幾種書目的大量借鑒。⁴⁸ 如果他的說法可靠的話，那麼《叢報》的書目當為此類漢學書目中最早面世的。

如果我們將這兩個書目的分類加以比較，就更能看出兩者間某種承襲關係。現將兩個書目的編目分列如下：

- A. 《叢報》漢學書目 (List of Works upon China) :
1. 中文學習工具 (Ai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 語法、詞典、會話等
 2. 西譯中文書籍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 典籍、雜記
 3. 關於中國的書籍 (Works on China) : 概述、遊記、條款、傳教記錄、期刊、外省、使用中文的鄰國、蒙古與滿洲
- B. 考狄《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 :
1. 中國概述(La Chine Properment Dite) : 地理、歷史、宗教、科學、藝術、語言、文學、風俗等
 2. 在華外國人(Les Etrangers en Chine) : 對中國的認識、商業、港口貿易
 3. 中外關係(Relations des Etrangers avec les Chinois) : 西方諸國、亞洲國家
 4. 中國人在海外(Les Chinois chez les Peuples Etrangers) : 對西方的認識、航海、出使、移民
 5. 中國的屬國(Les Pays Tributaires de la Chine) : 韃靼、天山(新疆)、西藏、高麗、琉球⁴⁹

儘管《叢報》是將「關於中國的著述」分為三大類，考狄是分為五大類，但仍不難看出考狄是在《叢報》書目第三類的基礎上加以細分的，可以說前者是後者的雛形。⁵⁰ 但要看到的是，考狄的分類更為科學、細緻，這與學科本身在發展前進是不無關係的。

這兩個書目的差異中有很多值得我們留心的細節，如：《叢報》將「中文學習工具」視為一大類，而考狄則將此編入「語言」這一小類中，這說明《叢報》時期

的漢學很大一部分內容還是側重在比較初級階段的語言學習上。當然，這與當時詞典編撰盛極一時的時代氛圍密切相關。其次，我們看到，中外關係格局發生變化等時代特點非常鮮明地在考狄的書目中得以體現、突出，如其書目中第 2、3、4 類。最後，考狄對中國鄰屬國的定義開始按疆域來區分，較之《叢報》按語言區分，更加體現其漢學研究某種「全球化」的現代特點，或者從某個角度而言，這種按疆域來劃分研究領域的做法賦予該學科一種殖民的視角。不管怎麼樣，通過這兩個書目的聯繫，我們看到了漢學研究從 19 世紀中期到 20 世紀早期這一段時間內的「現代化」過程。

從詞源的角度也可以追尋到漢學這一學科在《叢報》上的發展軌跡，即通過《叢報》對關鍵字「漢學」的理解和解釋，來看它與現代漢學概念所指和範疇的差距何在。

在《叢報》二十卷中，實際上並沒有出現“sinology”（漢學）這一詞，但有三處出現“sinologue”（漢學家）。《叢報》的正文中第一次出現“sinologue”一詞，是在 1838 年馬儒翰發表在《叢報》上一篇介紹中文學習工具書的文章中，這裏是指「學習中文的人」。⁵¹ 《叢報》中正式出現 Sinologue 詞條，就是在 1849 年的漢學書目前言中。在前言裏，編者提到編撰該書目是以“sinologue”為讀者對象。從該書目的內容來看，雖然其中有一大類是學習中文的工具書，但更多的是旨在幫助讀者從各方面全面瞭解中國的書籍。因而，對讀者（sinologue）的要求不僅僅是「學習中文的人」，還應該是對中國有一定瞭解的專家，這裏該詞的所指已經非常接近現代「漢學家」的涵義。

“Sinologue”在《叢報》中第三次出現是在 1851 年停刊時出版的索引中。對應的文章有三處，第一處見《叢報》第五卷所轉載的馬禮遜 1828 年發表在《麻六甲觀察與中國編年》(the Malacca Observer and Chinese Chronicle) 上的一篇文章，該文介紹了歐洲（當代）漢學研究的情況，認為當時稱得上「中國學人」這

48 Henri Cordier, "Preface,"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1904, v.1, p.2.

49 Henri Cordier, "Table des Matieres,"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1907-1908, v.4, pp.3237-3252.

50 後來袁同禮在考狄分類的基礎上將其細化為 28 類。

51 J. R. Morrison, "Review of the Facilities Existing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CR*, v.7, p.121.

一頭銜的只有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區區 8 人。⁵² 這裏馬禮遜在提到「中國學人」時，用詞是“Chinese student”。這 8 個「中國學人」的特點是：他們要麼編寫過中文學習詞典，要麼在中國文學、儒家典籍研究方面有突出成果（出版過專著）。另外在中國境內還有幾個懂漢語的人如：斯當東、米憐、麥都思等，但馬禮遜顯然認為他們不能入上面的「中國學人」之列。另外兩處分別見於 1839 年《叢報》第 8 卷，和 1842 年第 11 卷，這兩處在介紹當時中國問題專家時，所用的辭彙是 student 或 Students of Chinese，根據文章意思，是指「精通中文的人」。⁵³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章中都沒有 sinologue（漢學家）一詞，那麼可見索引中的 sinologue 只是衛三畏後來根據文章內容做出的概括。此外，《叢報》卷一第 11 期的「文學通訊」裏介紹了 1832 年 10 月號的《亞洲學刊》（Asiatic Journal）上紀念雷慕沙的文章，這裏《叢報》稱雷慕沙為“Chinese Scholar”。⁵⁴

從上文我們可以這樣判斷，在《叢報》上，“sinologue”這一詞詞義的固定是在 1849 年出版書目到 1851 年停刊這一段時間之間。在此之前，《叢報》中雖然已經出現代表其所指的「中國學人」，或能指的“sinologue”詞條，但可以看出在當時該詞的定義還處於一種游離狀態，並沒有固定下來。《叢報》為我們考察該詞在正式進入詞典前的演繹過程、亦即漢學學科史的發展過程提供了線索。

四

前面已對《叢報》中漢學研究的內容做了簡要的介紹，下文將從西方漢學學科史的角度，進一步闡述《叢報》在 19 世紀現代漢學發軔之際在上承下傳的過程中

所起的作用，這裏可以概括為：「承上」、「互動」和「下傳」。

作為第一份專論中國的英文期刊，《叢報》對前人，特別是耶穌會士在中國研究方面的整理（尤其是前文提及的書目）和評介——儘管對其不精確處也有毫不留情的批評，但這種總結本身就是對前人研究的肯定和接受——這一方面為現代漢學奠定了傳統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推進和擴大了歐洲傳統漢學的研究。《叢報》的「承上」不僅體現在其姿態上，應當看到的是，《叢報》無論其所介紹的書籍，還是其主論文章，都表現出對歷史地理、語言文字等主題特別的關注，這在思路與 1814 年前歐洲對中國的興趣仍有很大的承襲關係。在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上，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前輩的文化通融策略對《叢報》撰稿者尤其是這一批早期新教傳教士的影響亦十分明顯。同樣，他們也強調研究學習中國語言文化，但目的是為了方便傳播（西方）科學文明知識。因為，「知識就是力量」，這種力量超過任何一種武力征服，而且歷史證明武力征服從來都是徒勞的。⁵⁵ 隨著《叢報》在歐、美的發行，該刊關於中國文化的介紹和討論引起了本土的廣泛關注和參與，如 19 世紀 30 年代開始，在華傳教士在《聖經》漢譯過程中關於 God 譯名的爭論，就在英美本土引起了極大的反響。⁵⁶ 儘管「譯名之爭」引起的關注確有其宗教背景的一面，但它同時也說明了《叢報》當時在歐美本土產生的影響。有一個細節頗能說明問題：在第 17 卷上，《叢報》曾登載了法國漢學家儒蓮直接為《叢報》所撰的一篇文章，題為《西域書目評述》。文章前有編者按，注明該文是由作者本人（儒蓮）轉交給他在廣州的一位朋友，請他投遞給《叢報》。編者還解釋了由於該文原文過長，發表時有刪節，而且對文中原法文的漢語譯名做了些許更動。⁵⁷ 這一方面說明《叢報》在漢學研

52 他們依次是：Dr. Hager, Dr. Montucci, M. Rémusat, baron Schilling, Klaproth, Morrison, Marshman, Davis. 見：CR, v.5, p.148.

53 CR, v.5, p.55; v.11, p.161.

54 CR, v.1, p.470.

55 E. C. Bridgman, "Introductory Remarks: Presses in China & Study of Chinese," in CR, v.2, p.1.

56 當時在華英、美傳教士在《聖經》委辦本的修訂過程中，因在「神」或「上帝」何者為 God 最恰當的中譯名問題上發生了意見分歧，最終走向分裂。此為「譯名之爭」。

57 M. S. Julien, "Notices of Works upon the Si Yih," in CR, v.17, p.575.

究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歐洲漢學界的確認，另一方面，在這一中西雙向互動的過程中，《叢報》自身也成了接受和傳播歐洲漢學的園地。《叢報》通過對歐洲漢學的接受和批評，把漢學研究推向更加學科化、專業化的程度。

在美國報學家白瑞華看來，《叢報》的撰稿者名單實際上就是當時英、美的中國問題專家名單。⁵⁸ 這個說法其實還不完整，應該說是英、美第一批漢學家的名單。前文提到過“sinologue”這一詞在《叢報》中詞義的固定是在19世紀中期這一段時間。而實際上英、美漢學的起步也正是在這一段時間，按照馬禮遜的說法，他自己就是英國「中國學人」第一人，他的《英漢詞典》是英國漢學的開始。不管他這個說法在現在看來是否成立，⁵⁹ 但在此之前，英國人中連學習漢語的人都非常有限。在《叢報》的撰稿者名單上，我們幾乎可以找全英國第一代漢學家的名字，如倫敦大學首任中文教授吉德（1836）、中文韋氏拼音創始者、劍橋大學首位中文教授韋妥瑪（1888），以及德庇時、斯當東、馬禮遜等。美國漢學研究的起步與《叢報》的關係更為密切，因為在此以前，美國人自己沒有出版過任何有關中國的書籍，⁶⁰ 可以說，《叢報》本身就是美國認識和研究中國的開始。因此，從這方面而言，《叢報》主編裨治文被視為「美國第一個漢學家」也是順理成章的。⁶¹ 《叢報》後來的另一位編輯、耶魯大學首任中文教授（1878）衛三畏對美國漢學的影響或許更大，因為從他開始可以找到美國幾代漢學家代代相傳的線索。他的兒子衛廉士接替了他在耶魯的教席，並帶出來一個在中美關係史和漢學研究領域的第一位重量級人物賴德烈。如果不能說《叢報》開創了英、美漢學的話，我們至少可以說，英、美的第一批漢學家是在它提供的論壇上成長

起來的。或許，當時沒有其他刊物，而《叢報》適時地為這一批漢學家的成長提供了一個獨特、寶貴的發展平臺，這才是《叢報》與這批漢學家如此密切相關的原因。

此外，根據《叢報》的主旨和內容，耶穌會士等早期漢學所追求的考據實證的科學理性精神，在《叢報》上被進一步宏揚，這無疑也賦予了19世紀漢學研究某種「親歷親見」、博古證今的特點。而在法國，由於與中國的交流自18世紀後期起日趨冷落等原因，漢學家們極少生活在中國，因此更大程度上將中國視作古代文明的一種來研究。這一點也恰恰是《叢報》所代表的英、美漢學與法國漢學的分野之處。總之，在這一對歐洲漢學尤其是法國漢學承上啓下的過程中，《叢報》讓我們看到了西方現代漢學發展的軌跡，這是漢學研究從法國向英、美及北歐其他國家擴散的開始。

五

費正清曾預言：「美國漢學界一個最困難而又可能成果最多的領域」就是研究「在華傳教士的活動與東西文化交流之間的相互影響」。⁶² 這無疑使我們看到了考察《叢報》對中國的描述和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積極意義的必要性。

應該說，《叢報》面向西方讀者的姿態本身就展示了一種打通東西方的抱負。通過向西方大力介紹中國的文化、歷史、現勢，《叢報》在傳播中國文學、文化中充當了媒介，為中國文化在西方的流播提供了最基本的資料。《叢報》上體現中西文化交流互動的最生動的事件，莫過於《叢報》與近代中國人撰寫的第一批「看世界」的書籍的關係，如《叢報》對《瀛寰志略》的節譯

58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Kelly and Walsh, 1933), pp.28-29.

59 在現在看來，與他同時代的 J. F. Davis 因其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研究而更有影響。

60 見哈佛魏得納 (Widener) 圖書館書目，在1830年前，美國出版的關於東亞的書只有2本。轉引自費正清，《19世紀中葉的美國與中國》，載《美中關係史論》，M.歐尼斯特主編，社科出版社，1991，第24頁；又據 Latourette, op. cit., p.123，美國當時只有費城出過兩本歐洲人寫的遊記。

61 Susan R. Stifler, "E. C. Bridgman, The first American Sinologist," in *Notes on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No.10, 1942.

62 J. K. Fairbank, "Assignment for the 1970's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1969, pp.61-79.

與大力宣揚，與後來成爲中美文化交流佳話的「徐繼畬與華盛頓」有莫大的關係。此外，輯入了《叢報》部分節譯內容的《海國圖志》也引起了《叢報》的高度重視。《叢報》還記錄了一些中外文人交遊的線索，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在《叢報》第 20 卷上刊登的徐繼畬贈給英國漢學家鮑寧⁶³的一首詩，詩後給出了英文翻譯，對疑難處還做了注釋。⁶⁴《叢報》此前對徐繼畬及其《瀛寰志略》有多次報導，這裏在注中還特別惋惜地提到最近剛從《京報》獲悉徐繼畬被削職的消息。詩歌無標題，從文體內容來看，以當時那些在華的外國人的漢語水平，是很難杜撰出來的，而且，以《叢報》歷來求實的態度及其在華外僑中的影響，當也不會爲此杜撰之事。因此，據推測，該詩爲徐繼畬所爲的可能性是極大的。⁶⁵倘若如此，這一線索當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又一補充。

從形象傳播的角度而言，《叢報》的真實性、新聞性、現實性，爲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想像提供了被認爲是相對真實的材料。《叢報》作爲在中國當地發刊、又發行回歐洲、美國的這樣一份刊物，它作爲傳媒所具有的真實性、即時性方面的優勢和權威幾乎是其他本土的漢學書刊無法相比的。如中英、中美、中法條約甫一簽定，《叢報》便立即將其按中、西文版全文刊發。⁶⁶同時，正是由於它置身中國，與在西方出版的其他期刊相比，《叢報》更具有對現勢的洞察與關懷，

它關於鴉片戰爭和當時中國社會現狀的記載，現在成了研究那一階段中外關係和社會轉型的重要依據。

美國歷史學家丹涅特認爲，美國來華傳教士對中國的描述，實際上是「形成美國社會對中國、日本、朝鮮等地觀感的唯一適當或精確的來源。」⁶⁷前面提到過，在《叢報》創刊前，美國國內關於中國的書籍少得可憐，《叢報》作爲第一份、也是當時唯一一份美國人在華創辦的關於中國的英文刊物。對如此重要的文化現象，是應詳加闡發、分析的。《叢報》停刊後，衛三畏的《中國總論》在美國幾十年一直被作爲中國歷史的教材，在龍夫威（Fred W. Drake）看來，《叢報》對中國的描述和看法正是衛三畏撰寫《中國總論》的基礎。⁶⁸實際上，從《中國總論》收錄的內容和關注的對象來看，該書就像縮微了的《叢報》，這或許和衛三畏編輯《叢報》多年有關。《叢報》對處於發展時期的美國在 19 世紀後半葉直至當代對中國的態度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可否認，《叢報》中還包括相當大一部分在當時並不屬於學術研究而屬時事報導的內容，如《叢報》關於鴉片戰爭的報導、對中國社會現狀速寫式的描述、對《京報》的摘譯等等。但這部分內容所提供的重要史料，今天看來也恰恰是漢學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寶貴線索和材料。

63 見前注 33。

64 J. Bowring, "Stanzas from the Chinese, & Verses Sent to Dr. Bowring by Su Ki-yu," in *CR*, v.20, p.433.

65 筆者曾試圖在現有的《徐繼畬全集》中找到這首詩，惜未見之。

66 應該說，《叢報》是中外報刊中第一個（全文）登載中外條約的。

67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19th Century* (N.Y., 1941), p.558.

68 Fred W. Drake, "Protestant Geography in China: E.C. Bridgman's Portrayal of the West,"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Harvard U. P., 1985), p.94.